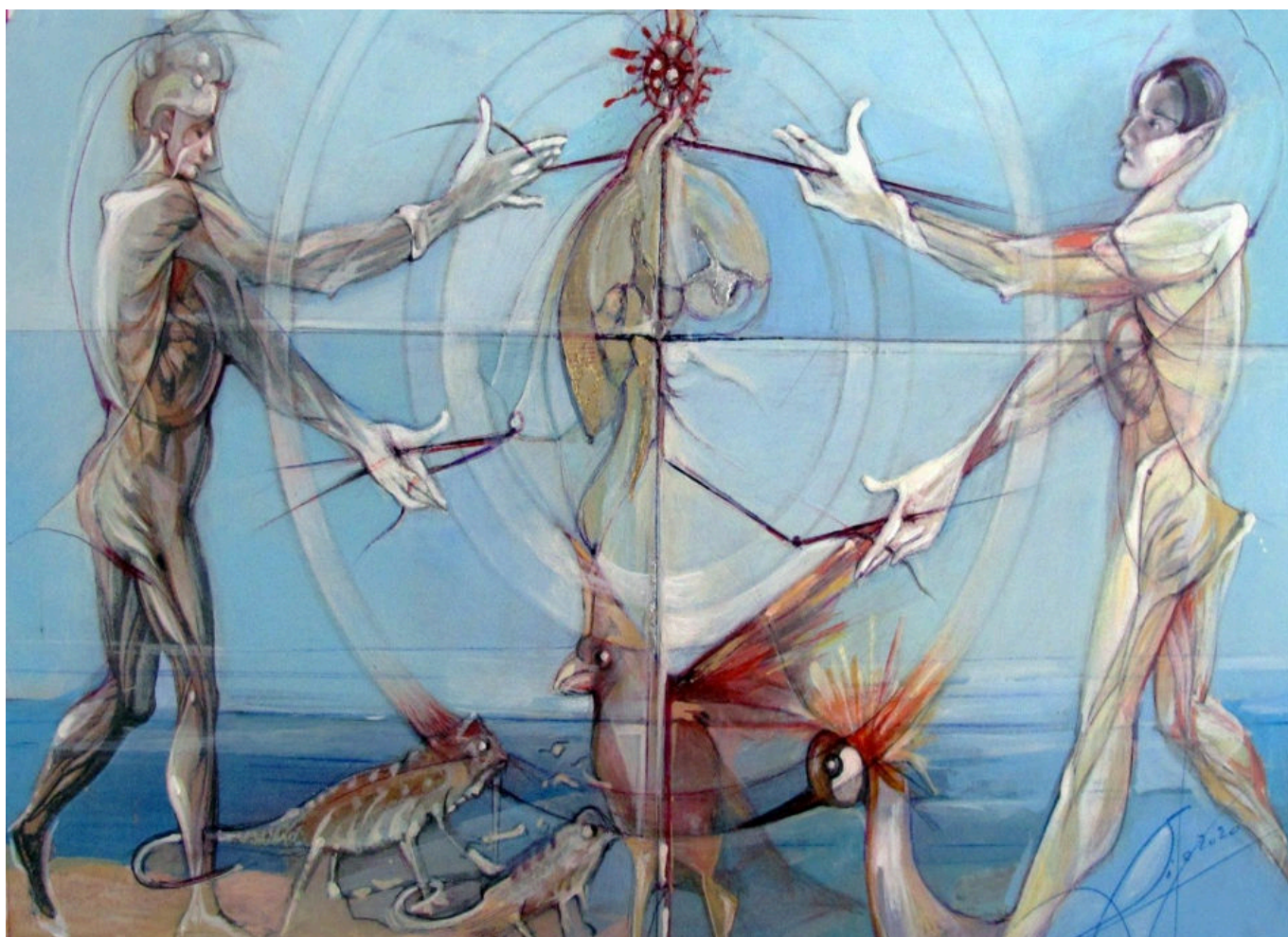


2022年第19期新闻稿：我们在动荡不安、谎言横行的世界渴求关爱



《不平等斗争》弗朗西斯卡·利塔·萨雷斯（西班牙）作于2020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这是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时代。新冠全球疫情本可团结人民，巩固世卫组织等全球机构的地位，重新

激发群众对公共行动的信心。巨大的社会财富本应用于改善公共卫生系统，包括监测疫情爆发、改善医疗系统以便疫情爆发时救治病人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世卫组织的研究**表明**，疫情期间，贫穷国家的医疗支出相对持平，而个人自付医疗支出持续攀升。自2020年3月新冠被**宣布**为全球性大流行病以来，诸多政府启动特殊预算拨款应急。然而放眼全球，一国无论贫富，卫生部门所得拨款“份额相当小”，大部分支出都用于救助跨国公司和银行，以及为民众提供社会救济。

2020年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因疫情损失约4万亿美元。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，“保障疫情准备工作所需资金……每年约为1500亿美元。”换言之，每年支出1500亿美元才有可能预防大流行病再次发生，避免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无法估量的人间疾苦。但此类社会投资如今已无可能。这是当今时代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。



《孟买的雨季》S·H·拉扎（印度）作于1947-1949年

5月5日，世卫组织发布新冠疫情所致超额死亡（excess deaths）的**调查结果**。2020至2021年的两年间，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约1490万。**据称**，印度的死亡病例高达470万，占总数的三分之一，十倍于莫迪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，印度政府后向世卫组织提出**异议**。两年内全球死亡病例逼近1500万，如此惊人的数字本应警醒世人重建不堪重负的公共卫生系统。然而事与愿违。

援引一项针对全球卫生资金的研究，2019至2020年，卫生发展援助（DAH）增加了35.7%，即137亿美元，远低于330至620亿美元的**预期**抗疫资金。无外乎全球模式，疫情期间卫生发展援助资金虽用于抗疫，各主要卫生部门的资金却在**缩减**（疟疾减少2.2%，艾滋病毒/艾滋病3.4%，结核病5.5%，生殖和孕产妇保健6.8%）。抗疫支出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，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卫生发展援助资金仅为5.2%，死亡病例却占全球的28.7%。



《改变身体》萨吉塔·R·尚卡（印度）作于2008年

当印度政府忙于与世卫组织争论新冠死亡人数时，由左翼民主阵线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正倾尽全力改善公共卫生。喀拉拉邦有近3500万人口，健康指标常年领跑印度28个邦。左翼民主阵线政府抗疫卓有成效，这得益于其大力投入公共医疗设施，与政府有关的活跃的社会运动组织领导公共行动，以及该邦的社会包容政策极大削弱了种姓和父权等级制度，少数群体亦能享受公共机构的服务。

左翼民主阵线于2016年起在喀拉拉邦执政，随即开始改善不堪重负的公共卫生系统。始于2017年的关

爱行动（Mission Aardram）旨在改善急诊、创伤等部门的公共卫生保健，将更多民众从昂贵的私人医疗吸引到公共医疗系统。政府这一行动依托于地方自治政府的**架构**，以便下放卫生保健系统的权力，更好地适应社区需求。行动还与多个合作社密切合作，其中包括有450万成员的妇女反贫困项目**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**（Kudumbashree）。公共卫生系统的重振使喀拉拉邦人民逐渐舍弃私人医疗机构，转而青睐政府医疗设施，其比例从1980年代的28%升至2021年的70%。

在推行关爱行动的过程中，左翼民主阵线政府还在喀拉拉邦各地建立家庭健康中心。政府在这些中心开办**病后诊所**，为受新冠相关长期健康问题困扰的患者提供诊疗服务。诊所的建立鲜少得到新德里中央政府的支持。喀拉拉邦的高级病毒学研究所、国际阿育吠陀研究所、**生物360**生命科学园的生物技术和制药研究中心等公共卫生研究机构**推动**传染病知识实现突破性进展，助力传染病新药开发。这些举措无不体现着关爱之心，使人憧憬一个关注公益而非私利的世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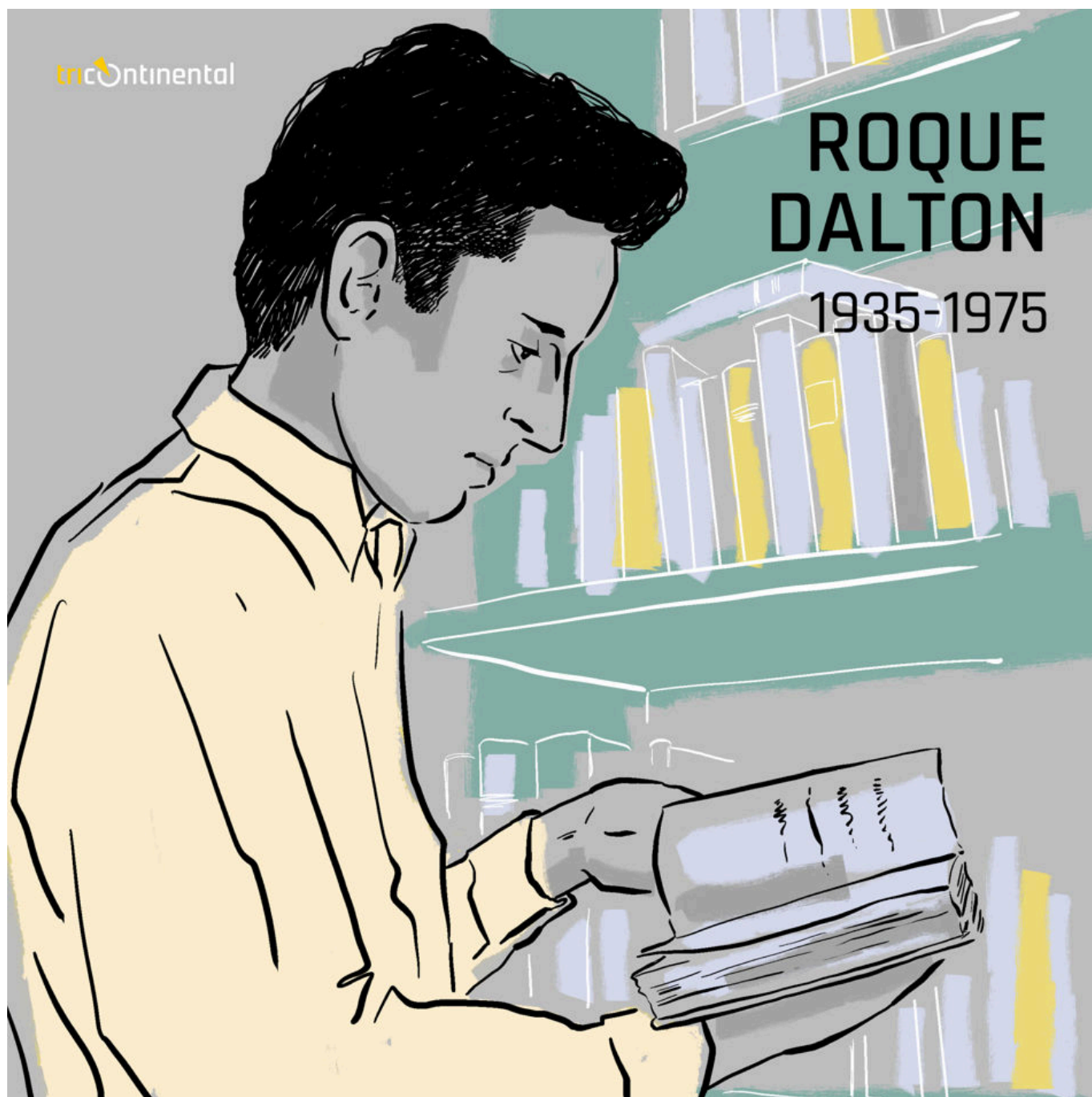
《起舞》阮思严（越南）作于1968年

2021年11月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26个研究机构通力合作，制定了《**拯救地球计划**》。该计划章节详尽，所有章节均为深入研究、深刻分析的成果。在重要的健康章节，有十三项明确的政策建议：

1. 发展针对新冠以及潜在疾病的人民疫苗事业；
2. 放开基本药物专利限制，促进医学科技向发展中国家转移；
3. 建立、健全公共卫生系统，避免商品化并增加投入；
4. 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部门的药品生产；
5. 成立联合国政府间健康威胁工作小组；

6. 支持、促进卫生工作者工会在工作场所乃至经济领域发挥作用；
7. 确保出身贫困或来自农村的民众也能接受医师培训；
8. 通过世卫组织及区域卫生平台加强医疗合作；
9. 开展活动，捍卫并推广生殖权和性权利；
10. 有关大企业如生产的食品、饮料被国际健康机构公认为有害儿童和公众健康（导致肥胖或其他慢性病）则应对其征收健康税；
11. 限制药企的营销推广活动及广告支出；
12. 建立无障碍公共诊断中心体系，严格规范诊断处方及价格；
13. 提供心理治疗，完善公共卫生系统。

以上建议即便仅落地半数，世界也能少些凶险，多些温暖。以第6条为例，在全球疫情开始的早期，支持医护人员等重要工作者就经常为人讨论。我所2020年6月的**汇编**《健康是一种政治选择》就声援了这些医疗工作者。但此后虽有喧哗，却不见成效，医疗工作者的工资依然微薄，工作条件依旧艰苦。从美国到肯尼亚，医护人员掀起罢工浪潮，但承诺的支持却未得到兑现。医护人员若能在工作场所得发言权，参与卫生政策制定，医疗灾难就不会重演。



罗克·道尔顿曾在1968年创作了一首关于头痛症与社会主义的诗，我们可从中体味拯救地球需要付出的努力：

共产主义信仰是美好的

哪怕有一大堆事情让人头痛

让共产主义者头痛的
或许是历史顽疾；也就是说
消除头痛的良方并非止痛药
而是人间天堂的实现
非此法不可

资本主义让我们患上头痛症
我们头痛欲裂
在革命斗争中，头成为定时炸弹

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
我们做好了头痛的准备
我们的头痛有增无减
而共产主义的一个功效是
像一粒太阳那么大的阿司匹林

热忱的

Vijay